

# 清末国文科教育所受日本的影响

## —以三段教授法的传播途径为视角

班 婷（广岛大学）

**【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所流行的赫尔巴特教授理论在国文科教育上的应用状况为着眼点，探讨了清末中国在国文科教育方面所受到的日本的影响。说起赫尔巴特，多数文献皆称清末的教育界流行的是五段教授法，却很少有研究详细论及三段教授法。事实上，在清末民初的国文科教育中，所流行的并非五段教授法，而是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引进五段教授法的基础上，加以改善之后的三段教授法。本文通过对《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的编写背景及过程的探讨，考察了三段教授法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和途径，分析了日本在国文教授法方面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国文科教育；日本；三段教授法

### 一、 导言

清末民初期，中国在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中受到了日本巨大的影响。其中，在教授法（1919年后逐渐改称教学法）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赫尔巴特教授理论的引进。1901年，由罗振玉、王国维所创办的我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上登载了一系列介绍赫尔巴特教授理论的译著，自此，赫尔巴特教授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五段教授法开始进入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教授法的主流。直至五四运动之前，五段教授法都对中国的教授法存在着不小的影响<sup>16</sup>。

然而，在国文科教育（即今日的语文教育）方面，当时所流行的却并非五段教授法，而是三段教授法。关于三段教授法，很少有文献进行详细论述，尤其是关于三段教授法是何时、如何进入中国的，至今无有结论。因为究其根源，三段教授法也属于赫尔巴特教授理论的一部分，所以经常被归入五段教授法一起探讨。

但是，五段教授法和三段教授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五段教授法是由赫尔巴特及其弟子、再传弟子所创，而三段教授法则是由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创。日本于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为中

<sup>16</sup> 陈必祥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心，掀起了对五段教授法的批判热潮。以此为契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五段教授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适用于各科目的各式新教授法<sup>17</sup>。在国语科教育方面，他们创立的就是三段教授法。也就是说，在引进五段教授法和引进三段教授法之间，存在着“通过日本引进德国的教授法”和“引进日本的教授法”的差异。因此，明确三段教授法的引进过程，对于研究清末期的中日教育文化交流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因此，本文试图考察国文科教育中的三段教授法传播至中国的途径，并分析其对于当时的国文科教育所起到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首先，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教育世界》的分析，重新梳理赫尔巴特教授理论导入中国的过程；其次，将通过对清末应用最为广泛的教授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的编写过程的分析，考察三段教授法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和途径。最后，综观清末民初期三段教授法在国文科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及其对国文科教育发展所起到的影响。

## 二、赫尔巴特教授理论进入中国教育界

在西方教育史上，赫尔巴特教授理论被公认为是近代教育学体系的首创。19世纪下半叶，经众多弟子的宣传和发挥，赫尔巴特教授理论逐渐在欧美各国教育界广为流传，至80年代末又开始传入日本教育界<sup>18</sup>。

1901年，王国维译出了日本学者立花铎三郎的《教育学》并登载于《教育世界》之上。此外，《教育杂志》还刊登了一系列相关译著，如《教育学》（第12-14号，汤本武比谷著，译者不明）、《教授法沿革史》（第25-28号，大濑甚太郎·中川延治著，译者不明）、《教育学教科书》（第29-30号，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小学教授法》（第36-36号，东基吉著，沈紘译）、《费尔巴尔图（即赫尔巴特——引用者注）派之教育》（第61-64号，著者、译者不明）、《德国大教育家海尔巴托（即赫尔巴特——引用者注）传》（第80号，威勒等著，译者不明）、《秩耳列耳氏（即威勒——引用者注）之品性陶冶论》（第96号，著者、译者不明）、《兰因氏（即莱因——引用者注）之教育学》（第134-138号、第140-142号，著者、译者不明）等<sup>19</sup>。自此，五段教授法在中国渐渐普及起来。

---

<sup>17</sup> 稻垣忠彦《增补版 明治教授理论史研究》评论社，1995年，第16页。

<sup>18</sup> 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9-350页。

<sup>19</sup> 《教育世界》1-142号，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190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

这些译著中，也有一些涉及到了国文科教授法。譬如东基吉著、沈纮译的《小学教授法》，在对五段教授法进行了概括性说明之后，列举了修身、国语、算数、历史、理科、图画、唱歌、体操等各科应使用的教授法。其中关于国语科（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国文科）的教授法，东提倡预备—提示—练习—应用的四段教授法。

但是，正如学者郑国民先生所指出的，当时的报纸、杂志等媒体不仅传播的速度慢，而且传播的范围极其有限<sup>20</sup>。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在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授书就成为了国外先进教授法引进和普及的重要途径。

### 三、从《最新教授法》看三段教授法的引进过程

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国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sup>21</sup>。随后，至1906年的两年间，商务印书馆又编写出版了其配套的教授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以下简称《最新教授法》）。在五段教授法正流行的当时，该书第一次使用了三段教授法。因此，探讨该书的编写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明确三段教授法从日本传播至中国的过程。本节将通过《最新教授法》的内容及其编者蒋维乔的日记《蒋维乔日记》<sup>22</sup>等史料的分析，来考察三段教授法的引进过程。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佛学家。1902年起开始学习日语，并经常翻译日本的报刊书籍。翌年受蔡元培之邀，先后任教于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同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至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部参事之前，一直在商务印书馆从事教科书编写工作。同时，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尚公小学兼任校长，并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师范讲习所一边从事教学实践工作一边编写师范教学用书。蒋维乔自1896年9月至去世的60年间，留下了珍贵的日记<sup>23</sup>。本文将使用1904年至1906年间的日记进行分析。

---

<sup>20</sup> 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sup>21</sup> 石欧·吴小欧《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之开端——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述评》《湖南教育：语文教师》2008(4)，第4-7页。

<sup>22</sup>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 第一册》（影印本）中华书局，2014年。

<sup>23</sup> 具体请参照拙稿《清末知识分子在引进国外教育时的自主意识——以〈蒋维乔日记〉为素材》《中日教育论坛》第7期，2017年，第1-5页。

## 1) 《最新教授法》的编写背景

在进入日记分析之前，我们先整理一下《最新教授法》的编写背景。1903-1914年的十数年间，商务印书馆和日本的出版社金港堂进行了合并。1903年，金港堂派来了教科书编写、印刷技术等方面的顾问。其中教科书编写方面的顾问有长尾楨太郎、小谷重两人。同年末，两人与蒋维乔等编译所人员一起开始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而关于《最新教授法》的出版，蒋维乔回忆道，教科书出版之时，“因出版之教科书，内地教员，多不知应用方法；于是每出版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sup>24</sup>”。

关于在五段教授法盛行的当时，《最新教授法》为何使用三段教授法这一点，该书在第一册的总论部分做出了解释。在总论中，编者先是就预备一提示一比较一总括一应用的五段教授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接着否定了五段在国文科教育上的应用，继而提出了三段教授法。具体原文如下。

（前略）以上五段教授法。皆本于心理学而定之。然欲拘泥此法以施于国文。往往不可行。何也。国文有文字。有意义。若二者各用五段法。则徒费时刻。使生徒厌倦。若二者同时并授。则于意义欲分配五段。尚非难事。于文字则文法错综。分段极难。故不可拘也。

近来教育家于国文一科。省五段为三段。曰预备。曰教授。曰运用。以免胶柱鼓瑟之弊。而文字与意义同时并授。凡宜用提示比较总括者。皆以教授一段包之。今将三段教授法列左。即本编所取用者也。（后略）<sup>25</sup>

也就是说，因为使用五段教授法太过费时费力，且文法方面难于分为五段，所以该书采用了“近来教育家”所创的三段教授法。

## 2) 《最新教科书》中三段教授法的引进

从图 1 可以看到，《最新教授法》是由蒋维乔和庄俞（1876-1938）所编写，编译所所长张元济（1867-1959）、编译所国文部部长高凤谦（1870-1936）、日本顾问长尾和小谷所校订的。那么，三段教授法是由编译所的哪位成员导入到

<sup>24</sup>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出版周刊》新 156 号，1935 年，第 9-11 页。

<sup>25</sup> 蒋维乔·庄俞编《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 年，第 1-2 页。

该书中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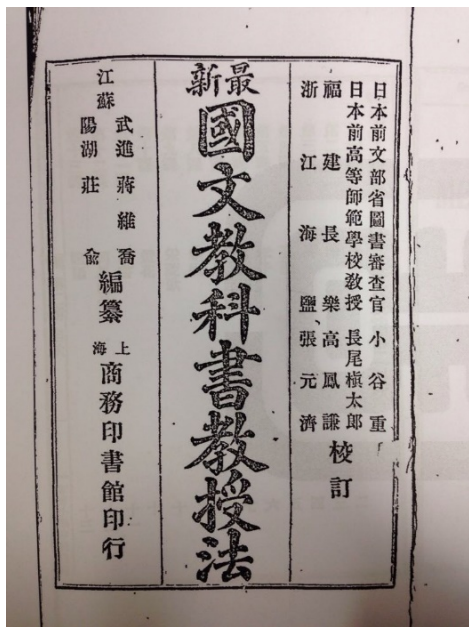
首先可以推测不会是编者的蒋维乔及庄俞，因为两位中国编者应该不会对教授法有如此详细的掌握。这一点从蒋维乔的教科书编写过程可窥一斑。1903年5月（本文所使用日记日期皆为旧历），经蔡元培介绍，蒋维乔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文教科书。然而，经过半年的编写，蒋在将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之后，竟然收到了需要重编的回复。因为他所编的教科书不符合“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画繁简定浅深”的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原则<sup>26</sup>。由此可见，蒋维乔对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并不熟悉，更遑论与教科书配套的教授法了。

再来看日本顾问长尾和小谷。由于史料限制，关于小谷，只知道其在被派遣到商务印书馆之前，曾任职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而关于长尾，他于188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先后历任学习院讲师、东京美术学校教授、第五高等学校教授等职，更是于1889-1902年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sup>27</sup>。上文中说到，三段教授法正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于19世纪90年代末发起的教授法创新的产物，由此不难推测当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的长尾对三段教授法颇为熟悉。

事实上，在蒋维乔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蒋维乔就教授法问题直接询问长尾，以及长尾指点蒋维乔的记录。如他在1904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前略）晤长尾君余问彼国教授读本时在课堂中果令学生朗诵抑係默诵长尾答在课堂内学员先择第一排学生垂指一人教员先教之读后令朗诵他生静听之毕即问其自知有读误处否若学生不知更问他生云汝听彼读有误否俟他

图1 《最新教授法》书名页  
（中国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sup>26</sup> 同注8。

<sup>27</sup> 樽本照雄《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 增补版》清末小说研究会，2004年，第122页。

生答后不差则再及第二排亦为之课堂中不可令学生齐诵恐乱而无纪也又诵书不必术熟但能明日默写无误即合若中学校有寄宿舍则有自修此时可听学生齐诵但不可高声乱喊（后略）<sup>28</sup>

翻看《最新教授法》可以发现，该书所使用的三段教授法中“教授”阶段的教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里长尾所介绍的方法。第二册第一课，在“教授次序”的“教授”阶段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前略）然后教员将全文朗读数过，并注意于读法之停顿，（首二句，一停顿，中三句，一停顿，末五句，一停顿，）既毕，任指学生中一人，令之朗读，余则静听，如读有差误，问本生自知误否，如不知，则依次问他生，又任指一生令读之，（后略）<sup>29</sup>

二者都是先由教师示范朗读，其后任选一名学生朗读，再使其自身反省有无差误，若学生回答不出，则问其他学生，直至无误后再任选另一名学生朗读。由此可以看出，长尾在《最新教授法》的三段教授法引进过程中起着直接且重要的作用。

当然，蒋维乔等人在教科书及教授书的编写过程中，也开始接触日本的教授书。如190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前略）编第二册教授法长尾来谈及名动等词惟中学校讲文法始用之小学不宜用余以日本小学教授书中亦有此等名目质之伊答言日本教授书求形式上之动目铺排此等文法实为缺点著书时往往蹈此弊不可从余甚韪其言（后略）<sup>30</sup>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蒋维乔在此时已经对日本的教授书有所了解，因此才能对长尾的话提出质疑。同时，也可以看出，长尾不仅对日本的教授法甚为熟悉，而且还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思考、改善教授法。

---

<sup>28</sup> 同注7，第345-346页。

<sup>29</sup> 蒋维乔·庄俞编《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1页。

<sup>30</sup> 同注7，第409页。

另外，上文中提到，关于《最新教授法》的编写背景，蒋维乔回忆道“因出版之教科书，内地教员，多不知应用方法；于是每出版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可见在教授法中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项，是该书值得一提的一个特点。而实际上，练习等项目的加入，也是基于长尾的提议。这一点可见于1904年3月13日的蒋维乔日记。

（前略）十下钟归编教授法长尾来谈及小学校蒙学生第一年第一学期每周国文授六小时分当有四小时为默写及作句为初入学儿童当未能写字则不默写但令之仿效起笔先后不能作句则教员将已读之字任举一个令之口答或联一字于上或联一字于下故也与商定教授法中添入练习一门（后略）<sup>31</sup>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最新教授法》是在蒋维乔等编者和长尾等日本顾问的共同编辑下完成的。其过程中，蒋维乔等人虽然也通过自学日本的教授法相关书籍来积累教授法知识，但主要起到教授法构建作用的还是长尾。可以说，长尾将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掌握的三段教授法的知识反映到了《最新教授法》中，进而导入到了清末教育界。

#### 四、三段教授法对国文科教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最新教授法》出版后，为当时不知教授法为何物的小学教师们提供了教学指南，因此“销行之数目，渐见发达<sup>32</sup>”。究竟是怎样“发达”的呢？据蒋维乔的回忆，《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出版后，大获人气，以至于“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sup>33</sup>”，而《最新教授法》的销量，“几并于教科书<sup>34</sup>”。可见该套教科书及教授法皆成为了当时小学教育界的主流。《最新教授法》之所以会流行，除了因其教科书流行这一因素之外，使用了适合于国文科教育的三段教授法，迎合了当时广大教员的需求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三段教授法也借由《最新教授法》的大卖而走进了教育者们的视野，并在其后的十几年，一直占据着国文科教授法的主要位置。以民初期的

---

<sup>31</sup> 同注7，第390-391页。

<sup>32</sup> 同注9。

<sup>33</sup> 同上。

<sup>34</sup> 蒋维乔《竹翁自订年谱》上海图书馆藏。

教授书为例，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1912年）及翌年分别出版的初等小学校春季、秋季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中华书局民国二年出版的初等小学校《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民国三年出版的初等小学校《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是当时初等小学校所主要采用的教授书。三者之间虽然在教授法上各有异同，然而就教学过程来看，可见统一（表1）<sup>35</sup>。可以说，在师资力量薄弱的清末民初的十数年间，三段教授法在推动国文科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1 三套教授法书中的教学过程

《新国文教授法》	《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	《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
1. 预备	1. 预备	1. 预备
2. 教授	2. 教授	2. 教授（形式、内容、文法）
3. 应用（语言、文字、事实、习问、提问）	3. 应用（连用、辨识、提问、造句、默写）	3. 应用

（引自郑国民（2000），第156页）

## 五、结语

本文聚焦于《最新教授法》，考察了三段教授法从日本引进到中国的过程和途径。三段教授法主要是通过曾经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的长尾楨太郎导入到了《最新教授法》，继而通过该书的热卖而逐渐在国内普及的。三段教授法的引进过程反映了中日当时教育交流的一个侧面，即清末对于日本的学习，不仅只是通过日本去学习西方，同时还存在着直接学习日本在整理、改善西方教育基础上所自创的日式教育的一面。

### 【主要参考文献及使用史料】

参考文献：

陈必祥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

<sup>35</sup> 同注5，第155-156页。

石欧·吴小欧〈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之开端—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述评〉《湖南教育:语文教师》2008(4),第4-7页

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稻垣忠彦《增补版 明治教授理论史研究》评论社,1995

樽本照雄《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 增补版》清末小说研究会,2004

使用史料:

《教育世界》1-142号,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190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

蒋维乔·庄俞编《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

蒋维乔·庄俞编《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06

蒋维乔《竹翁自订年谱》上海图书馆藏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出版周刊》新156号,1935,第9-11页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影印本)中华书局,2014